

双边与多边: 东盟与欧盟区域间关系的演变*

肖 斌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本文将基于东盟与欧盟区域间的合作, 分析和讨论东盟与欧盟间关系的演变, 试图从理论上解释东盟与欧盟如何通过双边和多边共存的区域间合作模式对国际治理结构起到作用, 以及区域间合作所形成的组织机构如何行使国际组织的一部分责任或成为跨区域政策的一个重要补充。

关键词: 双边与多边; 东盟与欧盟; 区域间关系; 演变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09)02-0017-07

尽管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 在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主要的行为体, 但实际上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民族国家主导世界政治的能力在不断下降。全球化重组了国际体系, 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区域组织和跨区域组织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 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过去几十年里, 地区性组织大量出现, 并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学者不惜笔墨, 大量分析了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起源、演化、效率、合法性及其行为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但是学者们仍然忽视了一个事实, 即“区域组织正不断扩展其对外关系, 并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行为体”。^[1] 虽然欧盟是区域性国际组织的领头羊, 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但是其他区域组织一体化的进程都在不断深化之中, 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

在20世纪70年代初, 东盟与欧盟之间的关系率先代表了这种发展趋势。作为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间关系, 东盟与欧盟30多年的合作为国际关系中区域间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一、区域间主义: 国际合作中新制度层次

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把区域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0年至1960年, 区域主义起

* 收稿日期: 2009-02-08

作者简介: 肖斌, 男, 河北人,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源于欧洲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理论,区域主义的出现引发了建立区域组织的浪潮;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区区域主义的发展阶段。新区区域主义通常与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一些弱小的民族国家通过新区区域主义整合地区资源,以提高自身的实力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新区区域主义建构了国际关系的垂直分工,并使之发展成一个多层次系统,涵盖了民族国家从全球多边层次到传统的双边层次。由于新区区域主义为全球和区域组织、低水平的国际体系搭建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跨区域论坛、次区域论坛机制就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东盟与欧盟的关系就是在这两种区域主义下快速发展的。

东盟—欧盟是一种集团对集团的关系,其特点就是定期进行对话与磋商,并在特定的政治领域内(贸易和投资、环境、预防犯罪、贩运毒品等)进行信息交流与合作。由于东盟与欧盟之间的合作没有共同的、超国家的机构,完全依靠双方自身的机制调节,因此,东盟—欧盟的合作制度化水平较低,通常以部长、大使和高官对话机制为主,有时一些辅助性的工作由专家工作组进行处理。而亚欧会议(ASEM)这种成员数量庞大的跨区域机制与区域性组织的标准不太一样,因为其成员国至少来自两个以上的地区,而且区域性组织的新成员也不能自动成为跨区域组织的成员。由于牵扯的国家数量多、区域范围广、同一性弱、跨区域论坛的议程复杂,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跨区域组织一般建立秘书处作为自己的政策研究和规划机构,协调会议和监督决策的执行。

一般来说,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区域合作重视程度不同。现实主义不重视通过建构国际规范来加强合作,认为国际组织仅仅是国家之间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只有增强实力,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合作。区域间和跨区域论坛仅仅被看作是维持国际平衡的工具和调节周边地区国际关系的工具。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合作是减轻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关键点,首先通过合作可以降低暴力冲突的频率,并提高人们的社会安全感;其次通过交流信息强化合作,在国家之间增强信任度、加强国家行为的可预测性;第三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和设计指导国家行为的规范、规则,因此通过国际合作来加强国际机制建设是和平解决争议的一个先决条件。可见,区域间和跨区域机制为国际体系增添了另一个制度层次,增加了国际体系的制度密度,辅助了双边国际机制的发展。此外,通过区域间和跨区域论坛不断在区域内部协调成员国的利益,可以在首脑会议和部长会议之前达成共识。通过协调的溢出效应更好地提高跨区域合作的质量。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是从相互认知为出发点的。国际行为主体与其他区域组织合作的过程中,也会受其影响而被体制化,合作是以往经验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认为这种区域间和跨区域对话可以促进地区集体身份的建构,消除在相互认知上的分歧,从而有助于激发促进区域凝聚力的共同准则,加强集体身份的认同,培育区域意识。

二、1972—1990年的东盟与欧盟:不对称的双边关系

针对欧洲的经济变化和为了改变亚洲大国力量结构,东盟和欧盟开始发展双边关系。首先,随着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加入欧共体,英国前殖民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担心失去其英联邦成员国优惠贸易待遇。东盟其他成员国也非常害怕随着欧共体贸易壁垒加强而失去欧洲市场。其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成为东盟发展与欧共体关系的动因。第三,欧洲方面也希望通过与东盟建立关系,提高其在该地区的竞争力,从而平衡美国和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第四,东盟国家内部的反日运动,也促使东盟需要通过发展与欧共体的关系来消除国内政治危机,如泰国学生“购买泰国”的运动和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访问印尼引发了东南亚地区强烈的反日情绪和骚乱。因此,东盟发展与欧共体关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进入欧

洲市场,与欧共体制定一个稳定农产品价格的计划,以及吸引更多的欧洲投资,促进技术转让和获得更多的发展援助。此后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东盟与欧共体贸易有了大幅增长,1971—1979年东盟与欧共体之间的贸易增加了10倍^[2],欧洲在东南亚的投资也不断增加,其投资总量超过了同期的美国和日本。东盟与欧共体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末制成品从23.8%上升到60%^[3],逐步替换了以交换初级产品为主的殖民地贸易结构。

实际上东盟经济地位的改变并非是因为欧共体贸易和投资的增加。尽管东盟和欧共体双边关系的建立为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影响力却十分有限。东盟早在1971年就开始享受欧洲委员会的普惠制(CSP)待遇,与其他地区相比跨区域联系并没有从欧共体获得更多的优惠,而通过洛美协定和特惠协议,分属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地中海地区的国家从欧共体获得的贸易优惠要比东盟多得多。此外欧共体的发展援助也同样让东盟感到失望,按东盟的人均计算,欧共体对东盟的发展援助远远低于非、加、太地区。不过即使有如此多的限制,东盟仍占有所有发展中国家与欧共体贸易总额的40%,东盟是欧洲普惠制主要的受益者。^[4]东盟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市场份额,主要原因是东盟通过集体的形式与欧共体讨价还价,要比单个国家磋商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难以否认的是,东盟与欧共体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高度不对称的援助者和接受者的关系。1989年,东盟仅占欧盟贸易总额的3.1%,比1980年的0.5%有小幅提高,与之相反,欧共体则占东盟贸易总额的15%左右。^[5]由此可以看出,欧洲市场对东盟的重要性要高于东盟对欧洲的。

对东盟来说,与欧共体建立密切的关系,对于东盟地区安全也有同样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终失败地从越南撤军。面对外交困境,美国在亚洲实行了收缩的外交政策。这样,严重依赖于美国军事支持的东盟成员国不得不直接面对他们极其恐惧的共产主义威胁,以及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力。更糟糕的是伴随着美国人撤离东南亚,英国人也撤出远东地区。作为一种替代方案,1971年10月31日英马联防协定由5国联防协议所取代。针对这些变化,东盟加强了区域凝聚力,期望通过扩大外交联系赢得国际支持。当1978年12月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占领柬埔寨,以及苏军入侵阿富汗后,东盟与欧共体两大集团的合作才有了具体的意义。东盟与欧共体开始共同关注来自苏联的威胁:欧共体加紧部署针对苏联SS-20导弹的防御计划;面对苏联现代化的太平洋海军和越南设立的海军基地,东盟也感到了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整个80年代,这些问题都是东盟与欧共体部长会议共同关注的政治安全问题。另外,共同遏制或降低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影响力,成为东盟与欧共体的共同利益。东盟和欧共体在联大会议上多次协调外交行动,共同谴责越南和苏联的侵略行为,呼吁地区和平。

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东盟与欧共体开始尝试通过自由制度主义发展双边关系。1972年东盟通过特别协调委员会与欧共体进行制度化的对话。同年,东盟布鲁塞尔委员会成立,它由东盟驻欧共体的外交代表组成,是东盟在布鲁塞尔的联络机构。后来东盟分别在波恩、巴黎和伦敦相继成立了大使级委员会,形成了每年与东道国外长进行会晤的机制;除了在1978年在曼谷设立代表处外,欧洲委员会也在东盟成员国首都设立了类似机构;1975年由东盟与欧共体官员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双边关系显示出制度化的萌芽。

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德前外长汉斯·根舍的积极倡导下,欧共体开始与东盟发展全面的跨区域对话关系。^[6]自1978年举行第一次东盟—欧共体部长会议以来,部长会议成为双方保持联系的一个重要制度,1978—1994年东盟与欧共体召开了11次部长级会议,平均每18个月一次,1990年以前就举办了7次。20世纪80年代初东盟与欧共体外长还利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的形式进行年度会晤。^[8]随着双方接触的增多,对话领域的扩大,最终在20世纪80年末,欧共体在所有东盟的成员国首都建立了联合投资委员会,此举有力推动了欧洲在该地区的投资。

尽管欧共体和东盟建立了很多沟通渠道,但是这些机制缺乏约束力,仅仅是一种低水平的制度

化。主要原因是：首先，欧共体最初并不重视与东盟的关系，因此不愿意在机制建设上投入太多的精力；其次，“制度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原则也有冲突，东盟崇尚的“东盟方式”是一种关系建构而不是一种“制度建构”，东盟方式强调的是共识、个性、灵活、务实的区域间治理，更重要的是不干涉合作伙伴的内政；第三，平衡地区力量是欧共体与东盟合作的一个主要出发点，而恰恰是这个出发点导致欧共体与东盟在深化制度合作的动力上极为有限。在上述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东盟与欧共体之间缺乏深层次的制度化合作。同时，这种低水平的制度化也限制和降低了国际组织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力。

三、1990—2001 年东盟与欧盟关系：从双边到多边的跨区域主义

冷战的结束为东盟与欧盟关系开辟了新篇章，也使西方发达国家失去了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冷战同盟的需要。于是昔日的冷战同盟与西方国家价值观上的冲突愈演愈烈，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初，西方许多国家包括欧共体把发展援助与遵守以上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西方价值观攻势可以看成是试图建立一种“软实力”，争取在国际政治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就是一个建立单极世界的借口，为此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并指责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1990 年之前东盟与欧共体的争论主要在经济方面，现在则扩大到政治领域。东盟与欧盟价值观冲突主要表现在第九和第十次部长级会议上，主要导火索是欧盟希望在新的合作协议中加入人权和民主的条款，以取代 1980 年的吉隆坡协议。^[9] 1991 年 11 月印尼安全部队镇压手无寸铁的东帝汶示威者，导致东盟与欧盟关系愈发紧张。1997 年东盟接纳了缅甸军政府成为东盟成员国，欧共体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双方开始在不同的场合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最终关系陷入了停滞状态。

鉴于亚洲普遍担心欧洲单一市场和“欧洲贸易壁垒”的出现，区域间主义开始在平衡经济关系中发挥作用。欧洲的特惠贸易安排为欧盟的扩大铺平了道路，东盟开始担心欧盟的贸易和投资重心将转移到东欧，这样将会影响到自身的经济发展。此外，GATT 乌拉圭回合的不确定性对欧洲和亚洲的农产品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对乌拉圭回合僵局的回应，1989 年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倡议下跨区域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亚洲开始把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一个平衡与欧洲关系的工具。随着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以及由于欧洲担心被高速发展的亚太经济边缘化，欧盟改变了对东盟的政策。1994 年 9 月第十一届东盟—欧盟部长会议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召开，欧盟对东盟的政策开始更加务实，会议主要集中在共同关注的经济领域，暂时搁置有争议的政治问题。1994 年 10 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首次提出创建一个新的国际论坛——亚欧会议，欧盟为了加强与亚洲国家的联系，减少 APEC 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响应此倡议，亚欧会议由此而产生。1996 年，亚欧会议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议，此后亚欧会议在亚欧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尤其 1997 年以后，东盟与欧盟的许多双边层次的对话都在亚欧会议中进行。但在 1997 年 2 月在新加坡举行了亚欧会议部长级会议，双方在缅甸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欧盟拒绝缅甸军人政府参与到与东盟的对话进程中来，声称除非缅甸军人政府停止镇压反对派并与之对话，以及释放政治犯。

由于东盟与欧盟关系陷入僵局，这对亚太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欧、亚 3 方力量平衡被打破。结果，东盟—欧盟联合协调委员会中断了 2 年多，部长会议则中断了 3 年。在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后，2000 年 6 月双方僵局被打破，欧盟终于允许缅甸和东盟其它新成员老挝、柬埔寨加入到对话进程中来，而缅甸仍然被排除在合作伙伴框架之外。但是欧盟也做了适当的让步，允许缅甸参加 2000 年 12 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东盟—欧盟第十三届部长会议，不过欧盟坚持把缅

甸的人权状况列入会议议程,而且要写入联合宣言之中^[10],因此万象部长级会议并未使东盟—欧盟完全回到对话轨道上来。

1990年以后,东盟与欧盟关系的主要政治成果是启动了亚欧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这是双方制度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东盟与欧盟开始通过多边合作来促进双边关系发展。随后,1994年欧洲委员会推出了针对亚欧关系的政策性文件“面向新亚洲战略”,并在欧盟(1994年)和欧洲议会(1995年)批准通过,这份文件成为1990年以后东盟与欧盟关系的基石。进入21世纪后,欧盟根据亚欧关系的发展又推出了《欧洲和亚洲:加强伙伴关系的战略框架》。该文件重申,亚洲是欧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伙伴;认为“尽管我们与亚洲的经济合作有适度的增长和发展,但是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深化和扩大欧亚之间的政治合作,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密切在世贸组织的合作,确保欧洲在亚洲的援助方案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促进两个地区之间的相互了解。”^[11]尽管在1990—2001年期间东盟与欧盟关系动荡,但欧盟仍然是东盟一个重要的外部合作伙伴。区域间和跨区域关系同时成为推动东盟与欧盟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东盟与欧盟平衡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工具。尤其是东盟通过跨区域关系使东北亚3国——中国、日本、韩国也加入其中,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东盟利用跨区域关系与欧盟讨价还价的能力。

四、2001年以后的东盟与欧盟:双边与多边共存的跨区域关系

进入21世纪后,东盟经济、政治、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盟各国逐渐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重新走上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2002—2003年东盟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4.6%,2004—2007年已达到6.1^[12]。虽然东盟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经济的发展,东盟也感受到了来自这些国家经济竞争的压力。在政治上,东盟国家的主要变化是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化,如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等国民民主化转型;在地区安全方面,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交织出现,增加了东盟地区安全的复杂性,如“9.11”后东南亚成为了国际反恐的第二前线。在经济方面,由于日益高涨的国际反恐浪潮,给东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2000年东盟经济增长率就已达6.1%,而2001—2003年却只有4.63%。^[13]此外,来自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如泰柬边界问题、南海主权问题等等,给21世纪的东盟地区安全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如此众多的全球性问题,东盟是难以通过自身的力量解决的。由此为起点,东盟倡导的多边主义就由次区域形式向地区形式发展,东盟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也从双边转向了双边、多边共存的合作模式。当然,这种变化与欧盟的多边贸易政策的调整也有直接关系,由于与世贸组织谈判进展缓慢,欧盟对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欧盟放弃了拉米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战略,而是采取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共进的策略,不仅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展开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也在区域层次展开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此欧盟官员评价说:“欧盟确实加强了多边贸易体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不会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东盟与欧盟在双边对话协商的基础上,还利用联合国、东盟地区论坛、亚欧会议这些多边机制加强对话合作。2005年9月欧盟派遣了200名观察员并参与“亚齐和平国际监督团”工作,在东盟为亚齐的维和行动提供的1500万欧元中,900万元来自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预算,其余600万元由欧盟成员国和各派遣国提供。^[14]缅甸问题一直是影响东盟与欧盟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东盟对缅甸的立场也开始松动,针对2007年8月15日缅甸反军政府示威,东盟表示“支持联合国对缅甸问题的斡旋,呼吁释放政治犯,早日解除政党限制。”^[15]2008年东盟与欧盟关系的重大发展是欧盟计划在2009年金边部长会议上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地区性组织签署该条约,为东盟与欧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开辟新篇章。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亚欧峰会上东盟赢得亚欧会议

各成员国领导人的广泛支持,在《亚欧首脑会议主席声明》中,领导人支持东亚、东盟和南亚一体化进程取得的进展,欢迎《东盟宪章》的签署,包括倡议成立东盟人权机构,以及《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的构想。^[16]

结 论

目前东盟与欧盟区域间关系正在平稳的发展之中,双方为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正不断深化合作。可以说双边与多边共存模式是东盟—欧盟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根据当代国际合作的现实来看,仅仅从双边或多边关系来处理跨区域关系,是很难有发展前途的。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民族国家自己不仅要去整合资源、去加强合作、去平衡各自的行动,而且还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国际组织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因此通过双边和多边共存模式提升跨区域合作水平就成为民族国家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必然选择。此外双边和多边合作模式还有利于协商主题的转移,从地区层次提高到区域层次,最后进入全球层次,通过这种模式避免高层国际体系过窄的瓶颈,使协商主题能顺利地在全球层次讨论通过。东盟与欧盟区域间关系发展主要动因是以全球治理为基础的,深化制度化进程是其必然选择,通过发展双边和多边对话协商有助于欧盟与东盟区域间合作机制的建设。此外,通过区域间和跨区域论坛不断在区域内部协调成员国的利益,通过协调的溢出效应更好地提高跨区域合作的质量。目前,双边和多边共存模式对推动区域间关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但是对东盟与欧盟区域间关系的发展而言,则是一个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注释:

- [1] Ginsberg, Roy H, “ Conceptualizing the European Union as an International Actor: Narrowing the Theoretical Capability - Expectations Gap”, i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7, No. 3, 1999, pp. 429-454.
- [2] Yeung, May T./Perdkis, Nichola, Kerr, “ William A. Regional Trading Blo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EU and ASEA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9. p. 83.
- [3] Norbert Wagner. *ASEAN and the EC: The Impact of 1992*, Published by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1, pp. 129-152.
- [4] Bridges, Brian. “ Europe and the Asian Crisis: Coping with Contagion”, in *Asian Survey*, Vol. XXXIX, No. 3, May/June, 1999, p. 77.
- [5] Teofilo C. Daquila, “ Obstacles to Closer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s: An ASEAN Viewpoint”, in *ASEAN & EU Forging New Linkages and Strategic alliances*, Published by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p. 105-153.
- [6] Chiang Hai Ding, “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 No. 4, March, 1981, p. 118.
- [7] ASEAN-EU Ministerial Meetings, <http://www.asean.org/12965.htm>.
- [8] Dreis Lampen, Barbara, *ASE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ventory and reevaluation of interregional relations*, Hamburg: Messages of the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1998, pp. 143-144.
- [9] Schumacher, Tobias; Hampe, Michael, “ EU-ASEAN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al Rhetoric and Economic Reality”, in *ASIEV*, Nr. 72, Juli, 1999, pp. 29-40.
- [10] The Thirteenth Ministerial Meeting, Vientiane, 11-12 December 2000, <http://www.asean.org/5644.htm>.
- [11] Europe and Asia: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Enhanced Partnerships Brussels, 4. 9. 2001 COM(2001) 469 final, http://www.delph.cec.eu.int/Docs/Asia_strategy_2001.pdf, (Retrieved on July 1st, 2006).
- [12] [13] “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7”,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May 2008, p. 35.
- [14] A new phase of EU-ASEAN cooperation: EU Monitoring Mission in Aceh, <http://www.delsgp.ec.europa.eu/en/whatsnew/aceh.htm>.
- [15]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ASEAN-EU Commemorative Summit,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asean/docs/joint_

B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evolvement of ASEAN: EU 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

XIAO Bi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As the perhaps most advanced 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 over thirty years of ASEAN- EU cooperation provide a rich empirical base for evalu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se ties. For this purpose an analytical ASEAN- EU Interregional relation will be developed in the next section. Viewed from different theoretical angles and the evolvement of ASEAN- EU relation,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coexistence of b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will be the potential cooperation model in the future.

Keyword: B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 ASEAN and EU 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

(上接第 16 页)

Strategic Rela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ASEAN

YU Chang sen

(Schoo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Japan and ASEA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constitute the three pillars of power. Interactions among these powers have not only underlain the basic patterns of the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but also to a certain extent determined the regional future. This article will utilize the analysis method of the “ strategic triangl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 discuss the interrela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ASEAN, and on this basis it will explore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pillars. And then, it will explain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policy choices of individual actors.

Key words: China, Japan, ASEAN, strategic triangle